

小说《撕裂》的书名是在诱发读者的“地震”想象吗?好像是。汶川大地震过去两年多,似乎没有人轻易用文学方式对其予以表现,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恐怕还在于,太过发达的媒体已经无孔不入,从当时还在发生中的震灾、劫后余生者的实况,到灾后重建,都一直被呈现于“受众”面前。相对于信息释放、报道实况、告知问题等“认识”的功效而言,文学的介入显然是蹩脚的,甚至是无能为力的。而且像“5·12”这样的惨烈灾害,实际上已不容再去进行什么虚构处理,或者是人为的戏剧化模拟了。话虽如此,并不意味着小说只有绕道而走,无所作为。媒体几乎可以呈现一切,但那可能是被指为“真实”和“客观”的“事实”层面,却不见得是想象与心灵的层面,这恰好是只有文学才可以自由进入的世界。这就是一部“抗震救灾”题目下的小说,其价值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与相似主旨的纪实作品同日而语,但我们仍然需要用小说去抵近该主题的原因。

《撕裂》的核心人物卿卿,是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存在的类型,她在灾难降临以后依然坚持的东西很多,包括对职业标准,对特殊“国情”要求下的妥协的反对,和对已是国际权威专家的丈夫的严正距离感,以及对一个并非自己“爱人”的军医安危的担忧牵挂。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张弛有致的抗震救灾斗争是一个无懈可击的世界,而在非常时刻陷入了非常矛盾的“凡人”的内心,反倒要不断陷入濒于失控的局面。另一位主人公林絮从慌乱到镇定的生命姿态亦复如此。《撕裂》不是有关“5·12”地震灾难主题的完美贴切的文本,却是有勇气介入并且警觉到了可能的人文灾难这一小说视域的最早作品。

《掩不住的阳光》的出版,至少有两重意义。其一,这部作品本身具有无可替代的对某些文学表现空白弥补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所谓“十七年”,曾经有过一段军旅文学的繁荣期,一大批表达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表现中国抗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胜利的长篇小说,几乎是集中出版并受到读者欢迎。然而,这部理应在当时出版的作品却被尘封,主要原因恐怕就是它写了一群几乎把牢底坐穿的人,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失败者。在一种总体上是欢庆、乐观和凯歌高奏的时代氛围下,描写被长时间关押的“政治犯”、“军事犯”们的日常生活,即便是描写他们不屈不挠的斗争方式,也很难成为“主旋律”。更何况作品还用不小的篇幅描写了国民党狱方人员的种种面貌,包括监狱制度及管理方式种种,例如试图以佛、道、基督教等宗教迷惑或改变“狂人”信仰。作品甚至也让蒋介石出场——为了亲自说服最重要的“人犯”方志敏。现在看来,这些最自然不过的文学方式和介入角度,自然是不可能被当时的出版者接受的。其二,《掩不住的阳光》被推后60年时间出版,虽然读来不免有隔世之感,书中人物、场景、细节却仍能吸引人,原因就在于这部作品高度的写实性。作者于玲的丈夫乔信明就是书中主人公“赵天明”的原型,而方志敏、刘畴西、周群、曾山、陈丕显、徐特立等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也都在书中悉数出现了,他们在真实的世界里,与作品主人公亦有过如小说中一样的密切关系。从文学对史实加以凸显的层面来看,此书向读者提供的,恰是中国革命史书写中常常有意无意被忽略的一个世界:斗争失败、陷入绝境、被关押和残酷虐待,且未能看到自己坚信的事业获得成功的人们的命运。为之作序的曾庆红同志认为,这本书是“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的故事,这无疑是对其历史书写价值的定位。事实上,无论其拙朴的笔法,还是过于直露的“思想主题”,都不能影响这本书对牺牲者们的人性光辉、生命意志和美好情愫的出色描绘,以及对生活于黑暗时代的人们渴望阳光这一强烈愿望的坚定表达。

如果一个今天的南京市民,在南京街头突然看到烧杀抢掠的日本军队,他将会作何反应?一个穿着解放军军服的、会讲日语的青年军官呢?他又将如何动作?南京军区作家裴指海如入梦魇般作此想象,在小说中让今天的南京城与1937年12月的南京城不断拼贴叠加,于近乎怪诞的图画中追踪

一个城市诡异的魂魄,再现一个城市阴惨的厄运,以及时空位移间集体记忆的缺损与失而复得。而小说的“正面”叙述,则是借由当年南京大屠杀中幸存的国军连长,现已90余岁的农民李茂才的回想来完成的。在我看来,这部称之为《往生》的长篇小说,是典型的因大屠杀历史叙述焦虑的副产品,可以想象,这样的作品还会很多,但与其意图负载的文学及历史使命,距离却注定是遥远的。

关于南京大屠杀,中国文学的失语可能和历史事件的悲惨程度及悖谬的事后界说有一定关系,然而,主要的障碍并非取决于对史实、数字,抑或日军兽行与中国军民的伤亡等实证性问题的解决与否,而在于文学的虚构与想象本身。当文学停留在诸如对屠杀对象、人数的争辩,对抵抗力量、抵抗状况的臧否,或者停留在对侵略者暴行的揭露,乃至中日历史认知的异同这些层面时,其实是将问题意识形态化,也就是将文学的任务简单化。西方文学对屠杀犹太人民问题的思考和介入,产生了不少计数的优秀作品,产生了像凯尔泰斯(匈牙利籍犹太人)和格拉斯(德国人)这样的在当年是分属对立民族或“阵营”的作家,他们的杰出性就在于他们能摒弃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意识形态思维而深入地理解人性,无论是法西斯主义者的人性,还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内囚徒们的人性。永远地研究人,把人置于历史的常态或癫狂中来考察,恐怕是文学的合适路径,这是我想提醒裴指海等青年作家们的一点。

刘静的《尉官正年轻》,是作家女军人形象系列塑造的继续。不过从作品中人物的年龄看,却像是在回溯几年前出版的《戎装女人》一书中主人公吕师们的“前身”。因为年轻,所以充满朝气,因为年轻,所以充满了爱,而且是防不胜防的爱。军营里的被军装和军纪包裹的青春躯体,会演绎出多少带有喜剧色彩的悲剧,或者悲剧色彩的喜剧,都属未知。此作中,刘静的诙谐笔法毕现无遗,以幽默方式破解枯燥的生活本质,用欢喜和笑闹来替代阴郁和灰暗生命色调,大约是作者的本性使然,她又一次轻松地做到了。

最后我想说说麦家的《风语2》。所谓的“中国密室”,其实就是麦家自己的密室,他忽而称自己是在把虚构故事写得让读者信以为真,忽而又称不把真实的故事披上伪装,以免在真实的世界里触犯禁忌。不过在我看来,这些全都是圈套:以麦家的小说智慧和叙述策略,他不大可能轻易放弃虚构,以真实世界里真实秘密的永恒性质而言,则他也不可能获得什么特别惊人的秘密,因为小说永远是小说,秘密也必将永远是秘密。这一次,在《风语2》中,为国民党“军统”工作的破译天才陈家鹤,和美国专家一起交流阅读《论持久战》(作者被“匿名”)的心得也罢,他的纯洁磊落但不幸恰好是日本人的妻子之死也好,特别是他苦思冥想对付的那些其实无关战争或政治宏志的密码也好,最终都是为读者们而准备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虚构和想象的胜利,是作家对读者而言的胜利。想到麦家已经为那么多的艺人、影视工作者提供了工作机会,想到在他一本书的背后竟然形成了一个让人惊讶的产业链,让很多的从业者各得其时,我不禁对文学的世俗化产生了些许宽容的念头,近年来文学自我降格的“卖身”之罪或许是可以赦免的?

如果我们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即目前中国文学中就算是最缺乏创造力的平庸之作,都有可能转化为衍生产品——受众庞大的影视剧生产,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这类文学的生产抱持公正客观一些的看法。何况麦家的写作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制造“文化产品”。他注重偶然,喜欢命运的巧合,他把思辨和玄想同所谓的正统叙事牵扯到一处,他追求语言的质地和光华,不惜让自己笔下的凡夫俗子有时候也道出箴言,他尤其对天才人物的极特殊人性及怪诞后果念兹在兹……这些都是真正低俗的作家们绝不会去追求的东西。麦家的面目模糊,比他的身份清晰可能要好一些?他是否是在“通俗”的外衣下运行自己的高妙的文学理想,有待观察。

## 为军人的生存证明

### ——2010年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读后

□朱航满

关于2010年的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创作,我很兴奋地读到了王凯的两篇小说,一篇是发表在《解放军文艺》2010年第8期上的中篇小说《终将远去》,另一篇则是发表在《西南军事文学》2010年第2期上的中篇小说《换防》。《终将远去》描述了一位连长在老兵转退中面对现实所作出的挣扎、退让和无奈,由此牵引出老指导员张安定宽阔而伟岸的军人胸怀,这位已经远去的上级曾一手培养了自己并把他改造成成为一名军官,而为了回报张安定,他曾违背老指导员的遗愿,把他的外甥周文明接纳入部队,但这个带有许多多气质的乡村士兵却最终没有被留在军营。《换防》则叙述了一位连长追述自己与指导员在面对面离开大城市换防到偏远地方所作出的不同选择,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的人生命运——指导员在换防后等自己从老部队带去的士兵全部复员后选择了转业,但在回老家联系工作的路途中不幸遭遇车祸死亡,而主人公自己则在换防后通过关系得以留守和进修,后又被调往上级机关任职,但因为酒后失言被下放到偏远的基层工作;也就是到基层报到后,由他负责处理指导员的善后问题时,他才慢慢懂得了这位自己曾完全不理解的工作搭档。这两篇小说在我看来,作家均善于通过日常平凡的小事情,直面和审视自我人性中软弱与黑暗的盲区,从而衬托出另一个人物在困境中所作出的奉献与牺牲,以及人性中的善良、高贵甚至是伟大。而更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作家毫不回避现代军人对于欲望的享受、克制、追逐以及较量,无论是对于生理上的,还是物质与精神上的,都是大胆而又很有节制地进行描述,王凯的这种克制冷静又充满摇曳风姿的笔触,似乎让我想起了几许朱苏进早年的小说味道。在我看来,这是对于现代中国军事小说写作的一种具有勇气的突破,因为欲望的绝对纯洁在某种程度上,曾经是描述英雄或正面人物的一个难以言传的“潜规则”。也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在王凯的笔下,这些人物的才是真实又饱满的,但又毫不让人感到猥琐和卑下,而人的命运也往往就是在这种对于欲望处理的复杂交替中完成的。

与王凯的小说一样充满现代气息的是裴指海的小说创作,但与王凯所不同的是,裴指海的小说在骨子里充满着一种叛逆的气质,这种气质在我看来,就是一种敢于对现有秩序进行怀疑、挑战和反抗的力量。在近年来的军事小说创作中,这种创作的状态是非常难得的。他的中篇小说《亡灵的歌唱》(《西南军事文学》2010年1期),以一种非常夸张和荒诞的手法书写了一名军校学员在一次意外死亡后,被集体塑造成为了一个抢救落水儿童的时代英雄的闹剧,作家从死去亡灵的角度来审视这一闹剧的开场、发展和高潮,充满了戏剧意味和反讽意味。作家的这种具有勇气的探索,显然带有一种批判和反思的力量,对于谎言的制造与偶像的真实面目给予了充满力量的揭露,而在我看来,作家更深层次的含义则是对人性中极端现实、愚昧与自私的激烈批判。军人的最高价值就是奉献于战争,军人死亡的最大意义就是在战场上与敌人较量的牺牲,而在和平年代,在作家看来,把一般意义上死亡给以夸大化甚至是扭曲化,几乎就是一种对于生命和个体本身意义上的侮辱、遗憾的是,我以为裴指海在创作中采用亡灵的这一叙述视角降低了批判的力度,增添了小说虚妄的色彩,对于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又缺乏细腻和深入的挖掘,给人感觉缺乏一种穿越心灵世界的光亮,终觉不够深邃和可以救急。

和平年代是一个没有战争的年代,准确说是一个正在准备一场未知战争的年代。在这个年代里,军人的意义与价值体现得并不那么突出,而很多军人的价值正是在日复一日的默默无闻的坚守与奉献中体现出来的,甚至是越有抱负,也便越显得格格不入与孤独无奈,这其中最让人感动的则是那些远离繁华、远离城市甚至是远离人群的军人,他们在一个寂静的世界里完成了人生价值的生成。卢一萍的小说《孤哨》(《西南军事文学》2010年2期)就是对一个士兵在独自坚守一个已经被撤消的岗哨的书写,在大雪封山的封闭世界里,他经历了寂寞、孤独、疾病、疯狂、失落等等折磨后,终于赢来了最后的自我超越,而作家具有创意的是,将主人公的这一经历转换成为人生“成

年礼”的一次精神蜕变,赋予了更新的精神意义;海存的中篇小说《我和冰川有个约会》(《橄榄绿》2010年5期)则通过一个列兵陆雪川的视角,描述了在高原哨所上寂寞坚守的青春期,小说通过主人公对于一个供销社上的女售货员关莲的暗恋,来展现在平凡寂寞的岁月里一段珍贵而波澜不惊的内心情感,在结束之处作家通过对主人公回归城市前后的对比,来表达现代人心灵的荒芜与浮躁;最值得一提的是唐本奇的短篇小说《孔雀河水》(《神剑》2010年6期),小说通过一个现代都市诗刊编辑的视角,叙述了一个在遥远的新疆木兰某实验基地从戎几十年后退休的父亲,他每日几乎都沉浸在对于往日岁月的记忆与叙述之中,在他的记忆里,那个几十年奉献年华的地方令人温暖而向往,充满了美丽的自然风物和山川景色,但等到他的儿子真正到达父亲所叙述的地方之后,发现竟是一片荒凉与衰败,也正是在这一刻,父亲一生的荣耀与价值似乎才得到了作为儿子的理解,因为在这荒凉之中,他忽然看到了一副灿烂与神奇的自然景象,那么令人心醉。

从军是当代中国社会普通人改变命运,而在和平年代,这种上升则更充满了一种生存的智慧和较量,反映在军事文学创作中,一方面是底层官兵的挣扎与奋斗,他们通过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农民式的智慧与潜能,不惜以于连式的途径和代价来获得改变命运的时机与可能。在2010年的军事中短篇小说创作中,包光寒的小说《营地故事》(《山花》2010年1期下半月刊)就让人感到意外,这篇小说实际上包含三个短篇小说,分别为《虹》《对弈》和《风中鸟》,描写了三名新兵初入军营的遭遇,其中《虹》格调清新而温暖,描写了一个新兵在深山哨所的寂寞光阴,以及因此而带来的心灵净化;《对弈》读后则让人感慨,作家在非常短小的篇幅内布局了一个新兵因为与班长有下棋的相同爱好,但从最初的求胜到最后通过精心谋划地求败,显示了军营特有的生存智慧与处世哲学,也从侧面挖掘出人性中庸常的一面;而《风中鸟》读后则让人有些无奈,它与《对弈》相反,描述了一位想在部队考取军校的新兵因为无法融入到现实的环境中,最终只能失败的故事,小说取名“风中鸟”,更有一种无奈而悲伤的哀叹之感。值得关注的还有作家王樾的小说《营门望》(《人民文学》2010年6期),作家以较好的小说技艺描述了一个名叫翠萍的乡村妇女平凡的一生,而巧妙的地方在于,翠萍的一生都与军营产生着密切联系,从她最初作为营门外的修鞋的生意人到最终她作为军人儿子的家属成为军营中的一分子,在这里军营成为一种符号存在于翠萍的心中,而当她真正进入这个似乎如卡夫卡笔下的城堡一样的军营大院之中,却忽然发现自己根本就不属于这里,小说以一种悲剧性的荒诞手法解构了一种本属于神圣的光环,让它显示出平凡的另一面。

与前者所不同的是,在军事题材小说创作中对于中高层军人寻找上升空间的斗争与较量,则显得充满机谋和智慧,这其间或许也不乏存在着对于更大权力所带来的个人能力与才华得以施展的渴求,但在缺乏死亡与危险考验的和平年代,通往上层的路径就必然会更多几许现实与世俗的较量。李忠效的中篇小说《深海》(《芳草》2010年2期),则是对于两个舰艇艇长在争取远航以及共同担任远航艇长这一艰巨任务中进行较量的叙述,其中既有斗智,也有斗勇,更有在面对出现的复杂局势时由各自站立的出发点不同,导致了相异的态度和认识,而这一较量的背后,既有对于军人光荣职责的担当,但也不乏有对于通过这一任务的完成,成为下一次职务晋升的重要砝码,因此这一较量就显得十分必要也特别激烈。由于军事小说作为意识形态的特殊功能,在小说的结束处往往会独特的升华之笔,在这篇小说的结尾便以谋求私利者的失败而告终;李骏的中篇小说《机关楼》(《西北军事文学》2010年4期)则把笔触对准了机关楼里的工作人员,通过他们的工作交际、喜怒哀乐以及升迁退败来揭示和平年代里一种独特生存哲学,作家在这篇小说中试图把军队“机关”描述成为一种现实中的“围城”——外面的人渴望里面的生活,里面的人却期盼能够够获得解脱。小说富有趣味的地方在于,王伟年轻时曾因为喜欢写作诗歌与小说,被当做写材料的笔杆子调往机关,但那颗曾对于世俗进行抗拒与挣扎的心灵,在接纳了更多世俗的益处后,让我各感遗憾甚至是叹息的是,已经逐渐地远去了。

## 全军首届雕塑创作培训班习作展作品选登



诸祖国检阅

房子剑 作



健将

韩正法 作



▲人体速塑 聂义斌作

◀俄罗斯老人像 陈雷作



支前

张诗贺 作



典将晨

王卓作



奔

曹天龙作



大刀进行曲

赵君安作



纯洁之河

郎钺作